

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張香山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286

2

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張香山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張香山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2 1/2印张 48,000字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0

统一书号: 7009·111

定价(5)一角八分

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張香山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北京

目 次

一、资产阶级右派在我国分配問題上放出的毒草·····	3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則·····	9
三、对资产阶级右派在我国分配問題上各种謬論的駁斥·····	23
駁斥“我国工人农民的收入悬殊极大”的荒謬說法·····	23
駁斥“我国存在着‘等級制度’”的反革命言論·····	38
駁斥“共产党人进城以后已經不再和人民同甘共苦”的謊言·····	50
駁斥“国富民穷”的挑撥性言論·····	57
四、絕对平均主义的根源和怎样克服絕对平均主义·····	66

一、資產階級右派在我國分配問題上放出的毒草

1957年，真是個不平常的一年。中國共產黨根據毛主席提出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方針，展開了全國規模的新的整風運動。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的廣大群眾活躍積極起來了，踴躍地向黨和政府提出了許多正確的建設性的批評意見。這些意見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它大大地幫助了黨和政府改進了自已各方面的工作，促進了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繫，從而把我國的社會主義的改造事業和建設事業大大地推向前進。

同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的廣大群眾相反，我們國家還有這樣的一小部分人，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同社會主義格格不入，視社會主義簡直象眼中釘一樣；可是對於早已奄奄一息的資本主義卻頂禮膜拜，幻夢有朝一日有個絕好機會，讓資本主義還魂復元。共產黨實行整風運動，廣泛地聽取群眾的批評意見，他們就誤以為共產黨不行了，是他們乘機出來了。於是資產階級右派在幫助黨整風的借口下，大肆攻擊，出盡洋相。共產黨和廣大人民沉住了氣，硬是不理他，他越發以為共產黨示弱了，廣大人民是倒向他，他越發得意，氣焰越發高，聲勢也就越凶；簡直把黨和政府

的一切政策，所有的偉大成就，我們國家和社會的各種制度罵得一文不值，好象中國除了復辟資本主義，再也沒有別的出路。

烏雲遮不住太陽，謊言也敵不過真理。不到兩個月時間，當中國共產黨率領人民向右派反擊，展開了全民大辯論的時候，右派分子就陷入四面楚歌、人民大圍剿的圈里了。右派分子除了繳械投降，倒真是再無別的出路。這是一場偉大的鬥爭，是我國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沒有這場鬥爭，不經歷這場鬥爭，不把這一仗打勝，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建成的。

現在全國人民已經打敗了資產階級右派的這次瘋狂進攻。但是思想鬥爭不同於其他鬥爭，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夠全部、徹底、干淨、干脆解決的，需要跟蹤追擊，深挖下去，否則就不能全勝。因此繼續地批判資產階級在我們整風中所散布的各種錯誤思想和荒謬言論，狠狠地鏟除資產階級右派在我們社會主義園地里偷植的各種毒草，再一次來擦亮廣大人民的眼睛，進一步來提高廣大人民的覺悟，仍是我們今後長時期的、艱巨的政治任務。

資產階級右派對黨和國家的攻擊，對社會主義的污蔑，真是無所不包，樣樣俱全。在這裡，我們不準備把資產階級右派所說過的荒謬言論一一列舉，也不想把這些荒謬言論一一抄錄在本小冊子里，我們只打算批判和駁斥資產階級右派對我們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惡毒攻擊。

資產階級右派為什麼要在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上大做文章

章？因为分配問題是同我們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人只要活着，就得穿衣、吃飯、住房；而穿得好坏、吃得好坏、住得好坏就同分配有关。一部分政治上落后的人，对于政治上的各种問題，常常漠不关心或者不置可否；但是对于穿衣、吃飯、住房問題却分外关心，斤斤計較。正因为这样，资产階級右派就認定在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向党和国家发动进攻，必能吸引众人，起煽惑人心之效；甚至可以把所有政治上落后的人，都席卷进来，成为他們浩浩蕩蕩的后备队伍。

资产階級右派知道，赤裸裸地端出資本主义的分配原則来同社会主义分配原則較量，是无能为力的；因而他們在攻击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則的时候，就不得不另要出許多花招。現在我們不妨把他們的各種花招列举一些：

资产階級右派裝出他們是农民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和卫护者的样子，替农民大呼不平。說什么共产党进城以后忘了农民，只顧工人。工人生活提高了，农民的生活不但沒有提高，有的反而下降。他們說，农民一天干了十三、四个鐘头，一年才掙兩百来元，城市里一个職員一年能賺六、七百元，差別太大；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提高工資，使工农生活相差更远，毀坏了工农联盟。右派分子还造謠說，农民收下的一点粮食，都給政府購走了，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粮食，有的只好吃糠，有的只好餓着肚子，生产很难提高，統購統銷把农村搞坏了。右派分子裝出一本正經的样子，大声喚喊：是时候了，把农民生活注意起来吧！物价應該調整，农业稅應該減低，农民的收入應該提高，工农生活水平應該拉平！总之，右派分子是用尽一切

心机来夸大和渲染工人农民之間的生活水平的差別。

資產階級右派还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姿態，大为工农群众“叫苦”。說解放以来，工人农民的生活还象过去一样，“衣不暖，食不飽，住在破棚陋屋”，“不少人过着半飢餓状态的生活”，“經濟上的鎖鏈还没有解脫”。他們胡說改善了生活的只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說这些人吃上了大米白面，穿上了呢子衣褲，着上了皮鞋，住上了寬敞的一套套设备的洋房，走路时有汽車代步。他們簡直把农民工人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描繪得一个是在“地獄”，另一个是在“天上”。这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右派有意地夸大和渲染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工人农民物質待遇的差別。

資產階級右派为了集中地攻击高級领导干部，却又轉弯抹角地說一般干部的生活还是清清苦苦，没有什么改善，只有高級干部才真正享福。說高級领导干部工資高，衣食住行“处处特殊”。右派分子还把高級干部因工作需要而得到的某些物質待遇，說成是受到“处处优待”和“处处照顧”。有些右派分子还不惜大造謠言，說什么提高工資的时候，一般不增，而领导干部却增加很多，他們甚至連最起碼的算术都不会，信口雌黃地說国家发行的六亿公債，还不够兩三千个高級首長的工資。至于其他有关高級干部待遇上的各种流言蜚語，挖空心思虛構的各種謊言，真是举不胜举的。右派分子把高級領導人員糟蹋到如此程度，真是令人不胜憤慨之至。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故意地夸大了农民同工人之間，工农群众同国家机关干部之間，国家机关一般干部同领导干部

之間的收入差別之后，又惡毒地放出了這樣的冷箭，說我們國家現在有了新的封建式的等級制度，处在梯級最下面的就是農民，農民上面的一層就是工人，工人上面的一層就是國家機關的一般干部，而处在頂端上的則是國家機關的領導干部。右派分子血口噴人地說：國家機關的領導干部就是“沒有生產資料的新貴族”，他們越來越富；而我國絕大部分的人，則越來越窮。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這樣地“罵倒”了我們的分配制度以后，就轉而攻擊中國共產黨。說國家機關干部特別是國家領導人員，主要是共產黨員，他們处于“養尊處優”的地位，根本說不上什麼和群眾同甘共苦。因此他們污蔑共產黨號召共產黨人和群眾同甘共苦的口號，是一種騙人的漂亮話。

還有一些資產階級右派，則提出了一種所謂“國富民窮”論。他們一面以偽善的面孔，對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建設，假惺惺地恭維幾句，說什麼我們國家比過去富強了一些；但是接着他們就露出了猙獰的面貌，說人民的狀況同國家的狀況相反，不但不富，而是貧窮不堪；國家是竭澤而漁，剝削了人民來從事建設的。

够了，够了，要把資產階級右派對於我們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的攻擊都列舉出來，實在是舉不勝舉的，也是令人心嘔和極其憤慨的。我們在上面舉出的這些謊言，已經足夠供我們認識資產階級右派在分配問題上到底耍了一些什么花槍，也足夠供我們作為批判他們的反動思想的材料了。

資產階級右派在攻擊我們國家的分配原則的時候，是否

明明白白的、系統地提出了他們對於分配問題的原則性意見呢？關於這一問題，是需要我們替他們加以歸納的。不論右派分子是夸大工人同農民之間的生活水平的差別，或者是夸大工农群众同国家机关工作人員之間、特別是同高級領導幹部之間的物質待遇的差別，也不論是胡說共產黨人不和群眾同甘共苦，或者什麼“國富民窮”，他們煽惑人心的基本思想則是要人民伸長雙手向國家索取一切；要求工人、農民、國家機關的各級工作人員不論干的是那一種工作，花費的是什麼樣的勞動數量和勞動質量，而他們取之於社會的報酬，不應該有多寡之分；要求不同工作的人們的收入應該同我們社會中取得報酬最多的人“拉平看齊”；否則，他們就認為是不合乎平等的原則。其實，這種思想並不是什麼新奇的思想，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稱呼它的話，就是絕對平均主義。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就曾經批評過這種思想。現在資產階級右派卻借用了這種思想，當作武器，來進攻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國家。

應該承認，在整風期間，資產階級右派所揮舞的絕對平均主義的乞食袋，的確使得一部分人，把它誤認為是耀人眼目的一面旗幟，而且也受到了具有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的青年同志的大大賞識。因而批判這種思想，揭露資產階級右派利用絕對平均主義所進行的不可告人的勾當，對於提高人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覺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

为了从根本上駁斥资产階級右派对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的攻击,我們不得不先来講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它同資本主义社会的、或我們旧中国社会的分配原则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同资产階級右派所借用的绝对平均主义又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弄清楚了这些根本問題以后,我們就有了弓箭,可以把资产階級右派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的种种謬論当作箭靶来射。

人們为了生活,必須进行生产。为了生产,就必须結成一定的关系和联系。人們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这种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很錯綜复杂的,它既包括着人們对生产資料的关系,即生产資料的所有制形式,也包括人們所生产的物質資料是怎样在社会成員間进行分配的,即分配关系;而被分配的物質資料,一部分消費于生产新的物質資料上面,而另一部分则归个人所消費,因而又有所謂消費关系。在有商品生产的社会形态中,物質資料的分配是通过商品交換形式来实现的,因而生产关系中又包括有交換关系。但是上面所說的几种关系中,人們对生产資料的所有关系,即生产資料所有制的形式,則是起着决定性的一种关系。它不仅規定

着生产关系的性質，而且决定着其他的一切关系，也就是有怎样的生产資料所有制形式，就会有怎样的分配关系、消費关系和交换关系。因此当我们要了解某个社会的分配关系究竟怎样，就必须首先了解某个社会的生产資料所有制究竟怎样。

例如，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占有了土地、森林、水源等的生产資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农民，而农民則沒有或者只有很少的一点点生产資料。这种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农民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完全归农民自己所有，而必須向地主繳納地租，向国家（最大封建主）繳納种种賦稅，剩下的才能作为个人的劳动所得。地主和封建国家从农民身上所取得的地租和各种賦稅，往往是不仅攫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侵占了农民的必要劳动的部分，即为养活自己一家所必需的部分。因此农民就不得不使自己“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如果农民不愿意那样地受地主剝削，那末农民就沒有地种，就得光着兩手餓死。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資产阶级掌握了社会的生产資料，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工人阶级必須被迫到工厂里为資本家进行生产，因而資产阶级就能够无偿地取得工人的剩余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大量的新的价值，过着荒淫驕奢的生活。工人阶级的收入就是出卖劳动力所获得的工資。这种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資，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不同，它通常低于价值，而且經常不能滿足工人維持其自身及其家族生活的最低限度的需要。特别是在失业人群增多的情况下，工資就愈形减少，因此工人阶级的收入也愈加下降。加之工人还要偿付种种賦稅，因而

工人階級實際上所獲得的勞動收入是微乎其微的。

我們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擁有各種工廠、原料，地主擁有大量土地，而工人階級一無所有，農民沒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一點土地。這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決定了舊中國的各階級的分配關係：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每年能夠獲得大量的利潤和地租，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而工农群眾的收入低得可憐，簡直過着犬馬不如的生活。大家知道，已被我們推翻的四大家族，由於他們過去掌握了國家政權，擁有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金融業獨占、商業獨占、工業獨占和農業獨占，因而他們每年的收入就占國民收入達50—60%。除了拿出一部分來豢養它們手下的武裝暴力、官僚、特務等等以外，四大家族每年的收入仍然約占國民收入的12—15%。因此四大家族在統治舊中國的十九年中，就積累了二百萬萬美元的財富。四大家族生活的豪華，在中國歷史上可以稱得上空前絕後。這裡，只要舉出抗戰期間眾所皆知的孔祥熙家族的大小姐結婚的一件小事就可以窺見一斑。

“有人曾就孔小姐飛美舉行婚禮所耗約略計算了一下，結果得出了下面一個統計：（一）孔小姐乘機飛美之消耗（暫以一架飛機計算）可以救濟兩千以上的河南飢民，就是使他們有飯吃，有衣穿，更可以設備一些維持生活的簡單工具；把孔小姐婚禮的一切開支和原先損壞的六大箱嫁裝一併計算在內，那麼一萬個飢民可以破涕為笑了。（二）把孔小姐結婚所耗和因趕制嫁衣工作的財部工作隊的工人去製造前綫戰士所缺乏的

服裝，大約中國師兩師人的軍衣可不發生問題；去制兵站醫院傷兵的衣服，那麼五十個兵站醫院的傷兵每人有一套新衣可着。（三）依靠這筆款子開辦一所設備頗為完全的大學，那麼在決定了校長之後，只要聘教授、出通告招生就行了。”

和四大家族的豪華生活相反，中國工人農民的生活是極端貧困的。且不說“包身工”那樣的工人是二十世紀的新式奴隸，就是一般的工廠工人，工資也是很低，不能養家糊口。據1936年申報年鑑統計，在1933年，十八種工業中的男工，平均普通工資每月只有十三元，而最低工資平均只有二元三角。女工的工資一般比男工更低。在十種工業中工作的女工，平均普通工資只有七元八角四分，最低工資平均為三元五角。但是當時上海每一個工人家庭，如果有三點八口人口，每月就需要三十二元錢的生活費；在北京，每一個工人家庭如果有四點六口人口，每月就需要十八元錢的生活費；在唐山，每一個工人家庭如果有二點八口人口，每月就需要二十四元三角錢的生活費。由此可見，當時一個工人的每月收入是無法養活他們的一家的。工人的工作時間也是很長，例如礦工，最長達到十八小時，鐵路員工長的也要達到十二小時，還有延長至十八小時的。

這種情況清楚地表明了工人階級所創造出來的財富，有絕大部分是被“分配”到資本家的荷包里去了。

農民的生活也極其悲慘。舊中國的地租一般占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甚至有高達百分之八十的。地主國家對農民的苛捐雜稅和征收的田賦也是極大的。例如，四川軍閥，

在1937年就把田賦征到了1991年。除了这种地租田賦的剝削之外，农民还要受到其他种种的額外剝削。例如，解放前湖南农民所受到的額外剝削計达120种。以下可以举出大家熟悉的几种：例如虛报田数——租約上的田数比实际要多，迫使农民多繳田租；例如欠租轉为高利貸，利上加利，加倍偿还；例如“粪厚加租”——佃戶把田种良了，地主就要加租；例如水租——佃戶用地主池塘的水，也要出谷；例如“指仓交租”——农民必須把租谷送往地主指定的仓库交納，要費很大劳力；例如交租“車谷”时，用风車重絞，每石要多交四五升；例如送礼，有送租鷄，租肉，稻草，豆子的；例如請酒，有請春酒，新米酒，看禾酒；例如大斗收进，小斗借出；例如无偿劳役：抬轎，舂米，挑水，晒谷，打魚，修房，帮地主办紅白喜事，每年少則十几工，多則三、四十工。在这样严重殘酷的剝削下，农民的90%以上的正产都給地主掠夺去了。因此农民很难进行簡單的再生产，遇到灾荒，連自己的生命也无法延續。特別是在国民党实行征实征購征借的那几年，地主把負担都轉嫁到农民身上，使农民无法为生。我在这里可以随手举出几个抗日战争前后农民悲惨生活的例子。例如1933年，“秋冬兩季，报纸上面几乎每天登着絕粮自杀的新聞。比較惊人的如：浙江常山江姓农户全家十五口目睹秋收无望，生路断絕，負債难偿，煎熬刺蛇十余碗，各自吞服，死者七人；長兴农民王某因田禾枯萎，收成絕望，借洋一元，購得砒霜，一家共食，当晚毒发，一家七口斃命。”又如“1946年河南安阳韓陵乡艾亭村一个叫做李金声的，全年收了七十石麦子，可是官方就派了九十石麦子，他老

老实地把收的麦子全数繳納之后，家里断炊了，于是全家十二口都服毒自杀了。在这同一个村子里，还有一个張金然，他有三角田賦，派了他六斗麦子，可是他只收了三斗，全数繳出后，他帶着妻子三口投井自杀了。济生乡第十五保張暮村五甲四戶一位四十七岁的寡妇，她把收的麦子全数繳出以后，还差一半多，她没有办法，用一条繩子，一头系她自己頸項，一头系住她那个刚刚十岁的孤儿，母子同时自縊了。”至于在飢荒年月，农民吃观音土、草根、树皮，甚至吃死人的事也是屡見不鮮的。象上述这种情况，年紀大一些的人，都是亲自耳聞目睹过的；但是对于青年一輩說来，可能已經是一种“故事”了。由此可見，旧中国社会的分配关系，真是不合理到頂点的。中国的工人农民干革命的勁头这样大，实在也是被这种苦难生活硬逼出来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关系与旧社会的分配关系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因为已經消灭了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已經消灭了剝削階級；全社会的生产資料都已成为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全社会的成員是由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識分子組成的。在这样的不同于旧社会的生产資料所有制的情况下，就产生了与这种所有制相适应的新的分配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农民以自己的劳动年复一年地創造出社会的总产品。在这个每年創造出来的总产品中，有一部分要用来补偿在这一年的劳动中所消耗的生产資料（已被用掉的原料、燃料、种籽；厂房、机械、工具的折旧等等），其